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康德式书写” ——评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

刘泽民, 郭华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活着之上》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浓厚的知识分子启蒙小说, 通过描写聂致远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活着诸相来展现一代人在理想与现实、良知与功利之间的精神犹豫和价值坚守。借助设置文化英雄群体形象, 小说主要从回归活着本身的探本观照、知识分子身份书写与书写知识分子形象、二元对立的人物价值世界等层面剖析了活着之上有何及怎样活的当代康德之问。阎真创作在情节描写和语言表达方面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 阎真; 《活着之上》; 聂致远; 功利主义; 知识分子; 良知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1-0161-07

晚清以降, 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与文学书写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奏响中国文学的主旋律, 从西学东渐、救亡图强到当代重修学术史、重返国学,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然而新世纪相关小说创作却如评论家雷达所述已经“变得零零落落, 几成断裂之势”。幸喜当前阎真的新作《活着之上》^[1]适时而出, 不仅在主题上续写着晚清特别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 而且在刻画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现实与精神现状方面有了新的开拓, 更重要的是小说明言将对知识分子活着诸相作形而上的探本观照, 这种坚贞抱朴的“致良知”与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正是每一位铮骨文人的守望所在。

2015年8月12日, 《活着之上》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①参与最后角逐并非偶然, 它历时六年乃成, 三年思考, 两年写作, 一年修改, 整理笔记超过两千条, 十一次删改全书。作品以湘中麓城师大为中心, 主要讲述了当代知识分子读书、婚恋、家庭、科研、事业等各层面的“活着”现状。作品从两个基本的艺术维度展开: 一是以主人公聂致远为代表, 展示出高校知识分子虽饱受物质困乏与精神困窘的双重压迫, 仍然一以贯之地心存理想, 恪守良知, 义利分明, 坚守人文道德的最后底线; 另一是以蒙天舒、童文斌、金书记为代表的对立形象群, 他们在每一场缜密谋划、精心安排的节略中, 钱权名利大获丰收, 得心应手于公众文化与社会上层, 操纵游走在公平与正义间。全

书首尾有意安插寻找曹雪芹作为精神楔子, 将目光投向悠远的历史长河, 确立屈原、司马迁、李白、曹雪芹等文化英雄群体形象, 在精神与功利的二元对立中引发读者主动思考“活着”背后可能存在的更高价值, 从而提出并回答其现代性的“康德式提问”: 人应当怎样活着? 康德之问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追问, 主张道德地活着便是其形上解答。

一、探本观照: 活着之上须 回归活着本身

阎真的作品取名一向发人深思。《曾在天涯》就曾经引发我们浪迹天涯的切身感受, 《沧浪之水》曾经把我们引向关于官场世道清浊浮沉的深思, 那“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的咏叹, 在我们耳边和心上久久回荡。现在, 《活着之上》把我们引向活着是什么、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的形上追寻和终极体验。

活着之上首先要解答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活着? 从物理发生学角度来讲, 活着就是生命机体客观地存在着。就人而言, 狭义的活着仅指肉身存在, 广义的活着则指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存在。活着本是人生最为现实也最为严峻的事实。因为它首先要保证机体存活, 然后还要保障精神、渴求、价值、取向的正常发育。

收稿日期: 2015-08-25; 修回日期: 2015-11-29

作者简介: 刘泽民(1957-), 男, 湖南宁乡人,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哲学与文艺理论; 郭华(1981-), 男, 湖南益阳人,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盐城工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哲学与美学

人为什么而活着?小说借聂致远之口指出,因为有良知、大义、理想等更高于肉身活着的存在。这种高于肉身的东西,不止表征着机体活着的意义,而且引人“心向往之”。作家史铁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活着无需辩论,死亡只是时间迟早问题,活着相对简单,但为什么活着,应当如何活着,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却一再叫文学艺术家们梦魂缠绕。对活着的道器之思,阎真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早在《曾在天涯》中,他就意识到“彼岸性意义的虚幻和终极目的在过程中消失的事实”,意识到“生命意义的有限性”是一种震撼心灵的事实,期盼读者“想一想自己的人生位置和可能的意义”^{[2](217)}。《活着之上》直接介入生活实践,现实地批判为活着而活着、活着就是一切的功利主义生存观。我们知道,意识到人生在世有着远高于功利性活着的存在,那需要“良知”。

人为什么活着,应当怎样活着并且活得更好,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康德式提问。这个提问既包含深邃的思想,又有强烈的现实感。《活着之上》采用正反两类人物形象群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在记录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历程中探索与沉思相关问题。作者将聂致远与蒙天舒在求学深造、婚恋生活、工作事业、跑论文课题、申报职称与领导职务等方面两相对比,让活着的物质现状以及由此衍生的精神境界一决高下,现实生存的真相由此昭然若揭:抱守良知、心存正义的人处处受制,事事慢人一拍,熟悉规则、投机功利的人则如鱼得水,处处占尽先机。作者借助聂致远将目光和思绪投向历史:追忆屈原怀瑾握瑜,含冤被逐,终生郁郁不得志,自沉汨罗江亦不随波逐流;曹雪芹“批阅十载删减五次”终成不朽名著《红楼梦》,却一生“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虽“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常识深不可测”,却大半生“在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贫窘的日子”,死后短短三百年后人竟连其身世也一无所知。表面看来似乎知识分子只要志存理想,执著良知,就必不为权势功利与规则交易所接纳,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巨大旋涡中。然而基于活着的最大事实,小说并未明确给出,亦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字里行间唯一可以明确的是活着背后仍是活着现象本身,因此活着之上的思考仍需回到活着本身才可能求得解答。

可以推断,得出活着这一现象须回归生存价值本身寻找答案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阎真是一位有理论

研究背景的作家,曾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尼采哲学深入研究多年。在评价新写实小说时,阎真采用现象学观点对意义进行了重新定位与审视,一方面认同“现象后面没有本质,它自身就是本质”,一方面结合新写实小说继续深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而言,形而上的意义,超出生活现象本身的意义,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目标,作者写出种种生活现象,并不只是为了表现现象本身,而是通过现象表达对事物本质的认识。”^{[3](140)}知其人,察其言,观其事,论其说。《活着之上》本身也是一部写实题材作品,由是推断,至少这是一种可能性较大的途径。

知识分子何去何从?这是个值得永远思考的重大精神问题。《活着之上》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启示。

一个是“致良知”,知行合一以求心安。孟子认为:“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明代王阳明解释致良知为达致内心良知,换言之是用实际行动实现道德意志,也即知行合一。在作者笔下良知既是温情的底线,又是最严厉的戒律。用西方话语来讲是要帮助人类从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中拯救受困的心灵,从而赢得精神解放走向自由,最终实现人的价值与最终归宿,也就是海德格尔所阐发的“诗意地栖居”。康德的墓志铭写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因为人有绝对道德律令,所以心存敬畏,不敢为所欲为。因为心有良知和道德,聂致远并不曾越雷池半步,在激烈的职称评审争斗过程中不屑揭发汪燕燕学术不端行为。连一向钻研现实的赵平平也不禁脱口说出离婚以威胁丈夫替李灿云入编一事陈情求票。相反,金书记们则是毫无原则地施压任课老师让有背景的学生刘沙过关,蒙天舒只手遮天强行让武斌多处剽窃的毕业论文获得了优秀,丧失了基本的道德立场。

另一个是“求仁得仁”,可以结合小说最后几段描述进行理解。聂致远戏剧般通过了正教授评审,似乎如释重负。与蒙天舒同赴北京跑课题,心力倍为憔悴,遂主动放弃。重游门头村,发现城市大开发已使曹雪芹故地草木全非,心里无限伤感。在西山上,作者对活着之上作了一回最彻底的思考。小说第51节写道:

想一想曹雪芹当年是怎么想的吧!他没有获得现世的回报,使自己从极度的贫窘潦倒中得到解脱;也不去追求身后的名声,在时间之中刻意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世。对一个中国文人来说,淡泊名声比淡泊富贵更难,可曹雪芹他就是这样做了。一生行迹的埋藏,是他生前做过充分思考的安排。牺牲精神是伟大的,但牺牲者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见证,这是人之常情,

无损于牺牲者的伟大。可曹雪芹他做出了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千古流芳的牺牲,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也许,认为他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是我用一双俗眼去看他,完全不合他的心意。高山仰止。曹雪芹最有资格接受这种景仰,虽然他自己对此毫不在意。

很明显,把曹雪芹的行迹看作刻意隐世,不求“理解和见证”,那只不过是“我”用世俗的双眼和观念在掂量曹雪芹。追寻到底,“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千古流芳”,从根上、从心底、从血性中淡泊名声,才是以曹雪芹为代表的文化群落的初衷和本真。因此,求仁而得仁,这才是作者所标举与推崇的活着之上的东西。

探究活着之上,古往今来均没有找到标准答案和知识体系,最后仍只能回归活着这一事实本身。所以小说最后一段,聂致远下山时的风景描写发生了积极的情绪变化,穿透树叶缝隙的阳光形成的光柱“似乎伸手就能握住”,树林里的空气“闻得到那绿色的气息”,辨不清方向的风发出“奇异的声音”“像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从这一个结局,读者依然只能读出作者对“活着之上”的一番审美体验,尽管其中细细的考量显山露水。

二、身份书写:人生在世与灵魂塑像

知识分子身份书写与书写知识分子是《活着之上》的主导风格。此处所谓知识分子身份书写,专指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现身说法:说人,说世界,说人生在世。所谓书写知识分子,则是指作品的主旨是替知识分子塑像:塑肉身像,塑精神像,塑灵魂像。

凭借知识分子身份进行创作,阎真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多年从事大学一线教学、科研与管理,对高校生活的形形色色,有着透彻的体认和领悟,在生活实践、教学和创作实践中养成了属于自己的理念。从《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阎真一直深情地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不是用“他者”目光,而是站在知识分子“自己”的立场,用知识分子“自己”的视角,返观“自己”以及自己群体内部的生存状态,因此,更能真切细腻地抒写那些难由外人所察所道的真实细节与内在感受。

《活着之上》因人论事,文人体验真切。作品写道:文人被迫转让一篇艰辛撰写的论文,向才识低下的政客低头,发论文跑课题,奉迎学术权威,这些,原本是令历来恪守气节的文人生不如死的行当。但是,文人再高贵也是人,他的个体以及家庭成员均要活着,

均要生存与发展,他作为家庭的主心骨就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你看,就是颇有正能量的聂致远,也不得不屈辱地接受八万元赔偿费购买新房,与蒙天舒周旋往来,参与赵一鹏的经济投机行为,非自愿地投身跑论文跑课题活动,甚至坦然接受学识远不如己的蒙天舒充任领导摆布自己的命运。诸如此类,阎真在作品中如数家珍,彰显出明显的题材优势,进一步说,是生存和生活的优势。

《活着之上》知人论世,文史底蕴深厚。聂致远言多出大家经典、行效先古圣贤之风,熟读《红楼梦》《报任安书》《传习录》,心崇屈原、司马迁、李白、曹雪芹,言行必以良知为底线。这与阎真“崇尚经典,艺术本位”^{[4](204)}的文学观分不开,故取题考究,以活着之上名篇;引文经典,大气者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细微处引曹雪芹送友人诗“日望西山餐暮雪”。他深入文学史,还原文化英雄的人格真相:屈原的意义在于“人的现世性没有绝对意义,人格原则心灵真诚高于富贵高于生命”^{[5](234)};李白并没有“因为对富贵渴望而放弃个性,保持了心灵的真诚和天性的狂放”^{[6](238)};曹雪芹付出一生,《红楼梦》字字皆血,只为“一吐胸中之郁结”^{[7](240)}。经过学者式的考查梳理,他发现“寂寞、凄凉、卑微、贫窘”,是坚守心灵真诚的文人一生所要面临的残酷现实,要求人人做到“屈原式的高洁、陶潜式的淡泊、苏东坡式的旷达、曹雪芹式的从容”虽不可能,但对于文化英雄们的人格、真诚和精神价值,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心向往之”。

书写知识分子,刻画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心灵史,是《活着之上》运思、运笔的重点之所在。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小说乃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之所以秘,在于这个历史真实不为正史、官修史所公开记载,是潜隐的、遮蔽的,或民间的,名不见经传的。在阎真笔下,《活着之上》也是一部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秘史。可以说,他第一次向世人全面地、集中地、公开地袒露了高等院校教学管理、职称评审、科研体制与学术资源在分配与竞争、遴选与淘汰、法治与人治各方方面存在的深层矛盾,暴露了导致学术创新能力长期低下的职称评审制度、人才衡量标准、人才选拔制度,以及科研体系中存在的权钱交易等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些矛盾和事实,有的是体制性的,如申报职称必须发表多少论文,必须达到怎样的档次质量,申报国家课题必须达到的门槛与标准等等;有的则是人为造成的,如核心期刊编辑凭借身份四处讲学收敛钱财,以学院名义出资合作办刊的十万元版面费最终

冠冕堂皇地流向了特定的权力人物等。无论是基于体制还是出于人为,这些负面的事象都是以往官史、正史与新闻报道所不曾涉及和披露过的,但是,它们却真实地血淋淋地存在着、涌动着,甚至左右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现在,作者将它们一件件挑出,供人反思、嘲讽、鞭挞、抗争。然而负面事象积重难返,而且充满魔力;与负面事象的抗争任重道远,甚至令人手足无措。譬如,聂致远们想要奋争与反抗却无处使力,甚至连对手的面目与位置也无法弄清,他越想打败它,反倒越打不败它。

阎真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有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他认为肯定知识分子价值坚守、重建良知更为紧迫,而不是止步于揭秘揭黑痛斥功利主义。在长沙召开的《活着之上》作品研讨会上他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要写出生活中的不足,作为反思的镜子和改进的标志”;抨击学术腐败并不是小说核心,核心是表现知识分子的价值犹豫与坚守,传递正能量。^②

阎真二十多年创作,正是知识分子迷惘、摇摆、沉沦、坚定诸状态的写照。如果说高力伟是流浪的知识分子、池大为是选择的知识分子、柳依依是堕落的知识分子,那么历史学博士聂致远则是一个在烦恼中沉思、从困惑走向坚守的知识分子。高力伟求学海外总有无根的感觉,绿卡快要到手时毅然选择了回国。池大为的迷惘更加明显:“可我,厅里第一个研究生,就这样过一生吗……科长处长这些我以前不屑一顾的头衔,现在都有了一种神秘的光环,可望而不可及。”^[8]女大学生柳依依无法抵抗物欲诱惑,主动堕落从清纯少女到甘作二奶。只有聂致远在与功利主义的抗争中,始终坚守着一份良知与本真,他不是道德的顶峰,却是现实的榜样。

就《活着之上》本身来看,聂致远也经历着这一蜕变过程。在妻子、同事、同学、他人编织的围城中迷惘冲突,从娶妻生子、申报职称到最后放弃跑国家课题,从经济窘迫地位低下到不惜得罪领导、评上正高,最终在追思文化英雄中维持着一颗良知的本心。在现实中阎真本人多次公开声称,像聂致远这样有良知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历史的车轮无情碾过,无根的海外漂泊,宦海浮沉的尝试,都只能为某一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提供活着在世的样本参照。但《活着之上》令人耳目一新,它以所有知识分子为对象,力图从哲理层面思考如何在物欲横流时期,最大范围地疗救当代知识分子日益衰退的灵魂,重振人文精神,并认真地把这当作自己的良知与使命,通过塑造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积极尝试直观活着本身来探索活

着之上的真正价值与意义。仅此一点,《活着之上》俨然一部人生在世的生活哲学。

三、二元对立:功利犹豫与价值坚守

《活着之上》抛开宏大叙事结构,没有史诗性波澜壮阔的场景描写,而着力构建简洁的二元对立来书写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活着现相与活着形上矛盾交织,如功利与良知、坚守与迎合、正义与操作、富贵与贫贱,在以聂致远为代表的坚守者与以蒙天舒为代表的功利者身上各有集中表现。阎真是一个有着强烈内省意识的人,这种二元对立显然是成功的,评论家李敬泽说阅读中他曾主动停下好几回来“看自己”,显然一些东西触动了他。

通过描写平凡小事表现时代大命题,阎真说他意图真切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犹豫、徘徊与知识分子精神坚守。^③对大多数人来说,像聂致远,这完全是一部充满理想与抗争的奋斗史,可能有希望,但更多时候只能充当规则与操作的陪衬与点缀,他的成长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首先是从不懂到懂味的认知转变。开篇回忆爷爷过世时说才懂得“离去是每个人都得面对的事情,包括我自己”,突然发现静虚寺做法场的和尚居然也要收钱,实际上是对自己经历是非起落之后一种后知后觉的幡然大悟,既然生老病死都是应自然面对的事情,那些人世间权力操纵导致的不公平、背良知也是应坦然面对的一种现实。在与赵平平分分合合的恋爱长跑中最终接受了她曾经与经理或老板有过“历史”的事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求助吴教授却不想反顺利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发表了论文,默认学生张一鹏提供的关于绿豆的商业秘密赚取外快,实际上正是源于对这些所谓规则无可奈何地顺从与适应。

其次是从迷惘到坚守的价值定型。历史学博士聂致远虽然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但专业冷门无法捞取外快,物质上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饱受来自以赵平平为代表的世俗价值观的精神折磨。在翻看《红楼梦新探》时,他深有感触:“古人的苦难在后人心中总是非常淡漠,可对经历者来说,却是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在现实中,他的个人婚恋曾因无力在麓城购买婚房导致了一年的中断,参加同学婚礼无法拿出高额的礼金,申报副高正高时面临的各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加剧了这名博士内心无边的精神痛楚。然而生活与现实的差距,自己与同学、同事的反差并没有让主人公意志消沉,聂致远在一次次比拼、竞争中愈挫愈勇,从屈

原、司马迁、李白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在不断反省中弥加坚定了自己对于活着的理想与信念。

其三是从平常人到日常事的场景铺垫。说暴露高校黑暗也好,说抨击学术腐败也好,有一点不容置疑,《活着之上》写的是平凡人、说的是家常事。一个没有家庭背景的教师,读书、恋爱、结婚、买房、生小孩、评职称、捞外快。就是在这样一个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活着的人身上,阎真写出了一代人在功利时代的迷惘和坚守。

学问之外有功利是作者对主人公聂致远的合理设置,并没有让他只闻圣贤、不食烟火。小说并没有大篇幅进行致良知、明明德之类布道说教,而是让聂致远在多次人生关键场合默默地放弃了利用规则就可能获得好处的机会,多次透露自己坚信这个世界还是存在那么一些人仍然坚守着道德与良知的底线处世行事,并且事实上也的确存在。对于这些历史的和当代的英雄人物内心无比神往,多次引用司马迁赞美孔子的一句话表白心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由于心向往之,充满唐吉珂德精神的聂致远朝着理想中的普世价值坚定地迈出了一大步。

而对于少数一些人来说,像蒙天舒,这只是一部充满惊险与刺激的成功史,偶尔会有插曲,但一旦进入圈子,过程与结果便都在掌控当中。小说精心设计蒙天舒出场带领读者直面触目惊心的真相,“直面真相是非常残酷的,可是不直面,真相仍然是真相,残酷仍然是残酷。”^{[9](1)}

学术内外唯功利是蒙天舒的现实写照。他一出场便抛出“屁股它能决定脑袋”的屁股中心定律,考试靠抄袭过关,通过调换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录上研究生,更换硕士生导师得以顺利留校,这一切都得益于同学兼好友的聂致远的无私“帮助”。从此踏上呼风唤雨、步步高升仕途的蒙天舒,继而强索聂致远研究成果获评国家优秀博士论文,迎娶娇妻、评上正高、当选副院长、申报博导与国家课题,操作规则极尽把玩之能事,无利不往,有求必成。然而发达后的蒙天舒在关键时刻却并不曾真心帮助当年的“阶梯”聂致远一把,有也仍只是利用与再利用。就连分配硕士研究生时也不忘把两个漂亮点的女生划拨到自己和童校长名下,充分利用话语权大小将抢占“养眼这点好处”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见,一旦剥除学术的外衣,蒙天舒们均是满目阿谀、沽名好色之流,人性丑陋一览无遗。

蒙天舒的成功隐藏着对权力颇具玩味的书写心理。不学无术者评上了教授无自明之心要抢当学术领头人,奉迎巴结者当上了学院领导无自知之心以优秀

管理者自居,自此学者不一心求学,授者无心治学传教,优秀教育资源的享用成为富贵阶层的特权。教育乃文明之源,是以这类玩味异常沉重不堪。麓城师大与麓城大学如此,北京的京华大学是否也如此;重点高校如此,是否大多高校大抵亦如此;那么中国学术的出路在哪,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在哪?作为文明传承与社会文化的精神支撑,知识分子日益蜕化,谁来对教育的未来与生存的未来负责。这是《活着之上》发人深思的又一原点。

四、情节与语言

《活着之上》主题的突转性反思经常引起情节上的突变,主要有服务于主题的大情境反思和忠实于现实的细节反思两种情形。大情境反思是以主题为参照,将突转的局部情节置于整体情境中进行的反思。因为服务于主题需要,必然引起情节设置的逆转。聂致远评选正教授这一情节最具有代表性。表面看来,结局颇出人意料,但如果置于活着之思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其用意才彰显无遗。聂致远本是个无关紧要的第三者。真正博弈的双方,一方是童校长弟子肖忠祥,一方是龚院长弟子孟子云。原本肖方胜算大,但随之而来的变数令事态变得扑朔迷离:变数之一是担任校评委会主任的是传言与童校长“有裂痕”的卢校长,变数之二是评选当天童校长虽布好了局但本人并不在场。导致投票现场僵持不下,午后出来的结果令人跌破眼镜:聂致远渔翁得利,竟然被评上了。剧情突转,博弈现场立即有人失声嚎哭,有人当场昏倒。小说在接近结尾处突然给之前从未有过出过错的规则与操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给这部始终充满着压抑感和严肃性的哲理性小说陡添了一幕戏谑性的讽刺喜剧,令读者始料未及。看似生生扭转的剧情开始引发人们重新审视整个活着,犹如鲁迅在夏瑜坟顶上平添的“一圈红白的花”,让坚如磐石的权力从内部爆裂开一道缝隙,即使它不是某种征兆性的信号或暗示,却至少留给了价值坚守者们一丝希望。可见,作者对活着之上的思考并没有陷入十分悲观的境地,仍象征性地保留着积极、乐观、光明的人生憧憬。

细节反思指对因局部情节需要而设置的反转性细节所进行的反思。这些细节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源于生活、忠于现实,一是所引起的情节反转服从局部需要。对于赵平平的刻画,小说泼洒下了浓浓的笔墨。复合当晚,她坦言需要时间整理“心情”,聊聊二字,深刻反映出她内心的激烈挣扎。她本性善良、活泼、

大方,却迫于母亲的压力一度中断了纯真的恋情,然而那些老板、经理的诱惑终于以受骗收场,生活再度回到起点,这是一转。面对真情,复合即意味着长期接受物质困乏,拒绝则可能失去最后的“过得去”的选择机会,这个孤身奋斗的女孩显然还没做好思想准备,为情节二转埋下了伏笔。类似细节还有很多。她精心记下的精品区婴儿用品,最终全换成了普通牌子;为了数百元宁愿丈夫放弃面子,又决然地为丈夫支付高昂的版面费;击溃了经理的欺骗、拒绝了编制的潜规则,却挟带着母亲、安安和她所有的物质欲望给聂致远制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些细节反转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女人,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活着最为残酷、真实的一面,而这正是活着之上最为厚实的现实基底。

以议论为小说,以诗化语言为小说,是阎真在语言方面取得的新突破。《活着之上》对语言的驾驭,较早期创作已有了长足进步。路遥文学奖授奖原因之一,即在于褒扬其朴实的语言风格,由此带来的是鲜活的人物形象,有张力的叙事。

以议论为小说是小说语言的显著特征。从内容来看,由于摒除了大篇幅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物的描写,意义和观点的传达主要在夹叙夹议中进行。如作者对知识分子金钱、面子与尊严的描摹,充满了一种阿Q式的解构和精神胜利法的戏谑。参加同学婚礼,聂致远起初决定出和蒙天舒一样多的礼金。又觉得太多,故意磨蹭着不上楼,等探得他人底细,立即降低标准,又故意到没有熟人的一桌登记。回礼产生了短暂的心虚,只消沈东阳一句“谁会记得你”便顿时平静下来,原来有“这么多人掩护我们”,于是迅速心安理得地融入了婚宴。

形式上,这种议论表现出一种自言自语的倾向。作者仿佛要跳过聂致远这个形象,抛开小说技巧,不顾读者感受,直接将他想要表达的感受与体验尽情地倾吐出来。因阻止赵平平打胎私自脱离课堂一事,尤为传神。事情发生后,聂致远既担心被学校查到,又怕被批评过的学生曝光。不安源于良知,良知却不能保证现实安全。提心掉胆地过了几天,终究两方面都没有危险反馈,于是“安心了”,对学生的感激发酵为歉疚。删除留存的短信也是意味深长的。生活已经如此艰辛,活着却要处处设防,那些隐藏的神秘力量使人焦虑惶恐、瞻前顾后。这些自顾自说的议论,往往就有我们自己的现实经历,因为太贴近生活的真实,以致经常在阅读中分辨不清,究竟是在读小说还是在读自己,是在看聂致远的活着,还是在咀嚼我们自己

的活着。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相比,这种议论风格构成了阎真创作一道独特的语言风景线,但也因艺术性受损而受到一些中肯的批评。

以诗化语言为小说是小说语言的又一特征。不少语句对称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如果讲究对称与纯美,那是诗词。如果追求凝练与突变,那是戏剧。如果抒写个人情意或文化解读,那是散文。但如果要融诗词、戏剧和散文优点于一体,那只有诗化语言的小说才有可能。《活着之上》对于古典诗词、典故的选用与化用,情节的突转与设置,既如诗歌也像戏剧。小说的一些节,如开篇第一节关于死亡与生命的思考,单独裁出都可以成为一篇独立的优美散文。还有文中追思古代文化英雄群的一些段落、语句,切割重排宛如诗歌清美灵动而富于哲理。如二上西山对曹雪芹的感悟,开篇那次写道:“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那坚如磐石的信念被震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信仰乍裂,因为初次体会到不为名利的崇高与心酸。结尾一次则写道:“千百年的历史,在教科书中被一页一页轻轻翻过,只有回到时间细微的褶皱之中,才能体验到他人生的寸寸血泪。”对活着的时空与意义之思,明显有了沧桑感和超脱情怀。由于作者将感同身受的浓浓情感融注在言语中,极大地充实了文章的肌理与血气。

语言的诗化倾向与议论化特征相得益彰。小说表面上是叙议结合,内里却是诗的、哲理的。说是诗,因为它追思文化英雄群;说有哲理,因为它对活着有形上的反思。阎真的诗化语言世界里,没有花草树木的自然风景,也没有亭台楼阁的人文景观,只有戏谑的语言、严谨的逻辑和强烈的自醒意识。他承认“绝对性”,肯定良知操守、知行合一具有永恒的“绝对意义”,规诫人不能做“屈从于物质性本能之限定的动物”,个人的现世生存并没有在时空上限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边界”。^[10]在当代作家里,阎真自己就是独特的一抹风景。他没身现实世界,向往着生生大德,只有读懂其间的议论,才能看尽躁动背后的洗尽铅华,只有读懂其间的诗情,才能理解活着之上的形上沉思。在这一点上,《活着之上》或许是唯一的,但阎真并不是孤独的。

五、结语

人应该怎么样活着,始终是个直抵心灵的哲学命

题。直面活着, 现实各有千秋。直观活着百态, 选择因人而异。有的人选择遗忘, 有的人选择遮蔽, 有的人选择玩弄, 有的人选择瓦解, 也有人在活着的同时不断思考活着之上可能存在的那些唤作真理的东西的本质。生活世界原本就是一种二元存在, 有功利便有良知, 虽不一定成等比, 但良知的存在即足以明证其正义与强大。

在谈及创作《活着之上》时, 阎真说道: “我理解功利主义, 人要活着, 不可能没有功利主义。但我又不能承认功利主义的无限合法性。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 这就是良知。”^[1]《活着之上》的结论是丰富的, 可能是知识性的、肯定性的, 也可能是苍凉的、否定性的。正由于艺术具有这种发散性特征, 活着本身始终朝向哲学与未来敞开着形而上思辨的大门, 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康德式之问呼唤着良知时代的来临。

注释:

- ①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作家网的公告信息进行整理。2015年8月12日, 经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第五轮投票产生10部提名作品, 其中包括《活着之上》。8月16日, 经第六轮投票产生5部获奖作品, 《活着之上》惜未在列, 排名顺位第六。参见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告[2015年]第2号、[2015年]第3号[EB/OL]. [2015-08-17].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 ② 根据阎真在湖南省作家协会于2015年3月14日在中南大学文学院召开的“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研讨会”上的发言进行记录与整理。

- ③ 根据2015年3月3日在北京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研讨会”上阎真的发言和中国作家协会网站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整理。

参考文献:

- [1] 阎真. 活着之上[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 [2] 阎真. 追求我们生命的意义空间——《曾在天涯》写作随感[C]// 阎真文集: 渴望澄清之水(卷五).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3] 阎真. 阎真文集: 现代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卷四)[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4] 阎真. 崇尚经典, 艺术本位[C]// 阎真文集: 渴望澄清之水(卷五).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5] 阎真. 屈原的意义[C]// 阎真文集: 渴望澄清之水(卷五).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6] 阎真. 遥想李白当年[C]// 阎真文集: 渴望澄清之水(卷五).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7] 阎真. 无人见证的牺牲[C]// 阎真文集: 渴望澄清之水(卷五).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8] 阎真. 沧浪之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9] 阎真. 这是一个重新定义爱情的时代[C]// 阎真文集: 因为女人(卷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10] 阎真. 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零距离表达——《活着之上》写作随感[J]. 当代文坛, 2015, 34(5): 128-129.
- [11] 阎真. 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J].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5, 11(1): 141.

“Kantian Writ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On Yan Zhen's novel *Beyond Living*

LIU Zemin, GUO Hua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eyond Living* is an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novel with strong realism, which, by describing the state of life of such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s Nie Zhiyuan, displays the spiritual hesitation and value insistence of a generation in fac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 or conscience and utility. By setting group image of cultural heroes, the novel is attempting to conduct a profound analysis into Kant's question of what and how to live from three major layers, that is, returning to things themselves, writing the identity and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exploring the characters' world of value in binary opposition. Moreover, Yan Zhen realizes breakthroughs in the plot and language.

Key Words: Yan Zhen; *Beyond Living*; Nie Zhiyuan; utilitarianism; intellectual; conscience

[编辑: 胡兴华]